

辽代汉人数量考

蒋金玲

【摘要】因史料限制,辽代人口问题是辽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参考“临近区域参照法”对辽代汉人数量与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的比例进行了重新估算,得出辽代汉人户数约为 62.78 万,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49.2%,如按每户 8 人计,则辽代汉人数量为 502.2 万。上述数据是依托《辽史·地理志》的记载得出的,加上不入籍的僧尼、隐户等,汉人人口占辽代总人口的五成以上应该是成立的。

【关键词】辽代;汉人数量及比例;《辽史·地理志》;临近区域参照法

【作者简介】蒋金玲(1978—),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长春 130012)。

【原文出处】《黑龙江社会科学》(哈尔滨),2024.2.81~8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韩国碑刻中的辽宋金元史料整理与研究”(23BZS052)。

研究辽代人口问题,主要凭借的是《辽史·地理志》关于各州县户口的记载,但由于数字残缺严重,致使这一问题成为辽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学者们只能根据残存数据用不同方法进行推论,尽管成果较为丰硕,但仍有不少问题悬而未决,如有关辽代汉人的数量、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的比例,依然没有可信的结论。有学者指出,汉人的数量在辽代占有“绝对的多数”(刘浦江指出,辽代境内分布着契丹、汉人、奚人、渤海四个主要民族,其中“汉人的人口数量占有绝对的多数,理应是辽朝民族关系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1]。不过此“绝对的多数”之结论并未经过具体推算),辽代“确系以汉人为主,而契丹、渤海人副之”(谭其骧根据《辽史》之《本纪》《兵卫志》《地理志》对外徙“种族”的记载指出,辽代契丹虽为统治民族,“但人口特少”,大抵“城郭之居,农事发展之区,即为汉民族势力之所在地。此不特中京、东京为然,即契丹根据地之上京亦然……可见汉人在临潢之众多,并其势力之雄厚足以左右国是也。西人以契丹称我中国,实则契丹国确系以汉人为主,而契丹、渤海人副之者也”^[2])。也有学者对

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进行过具体推算,但结论差距较大,分别为四成、五六成与六七成不等。笔者以为,辽史研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只有确知汉人的数量及其在辽代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才能对辽代“因俗而治”的政治体制、“汉契一体”的民族政策及契丹统治者的政治智慧等有更深层次的理解与把握。

一、辽代人口总数辨

学界目前专门以辽代人口或户口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有 20 余篇,也有不少学者如魏特夫、葛剑雄、吴松弟、张国庆等在有关中国人口史或辽代社会史的著作中探讨过这一问题。21 世纪以来关于辽代人口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0 年,出版的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首次提出辽代人口突破千万大关^[3];2007 年,通过答辩的王孝俊博士论文《辽代人口研究》^[4],则是学界第一部就辽代人口问题进行专门、系统、深入探讨的成果(五年后扩充为袁祖亮主编《中国人口通史》的“辽金卷”。关于辽代人口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可参考此书^{[5]13-25})。但有关辽代人口的讨论仍未停止,研究

向精细化发展。

由于关键数据的缺漏,学者在有关辽代五京州县人口、部族人口、人口总数、家庭人口规模等许多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譬如关于辽代人口数量,研究结论从230万到1300万不等,相差四五倍之多;关于家庭人口规模,则有5口、6口、7口、8口之说。辽代人口总数与家庭人口规模问题与笔者拟探讨的汉人人口数量问题密切相关,故对前人成果按发布时间简析如下。

(1)1949年出版的美国学者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第一部分“行政地理与人口”中,依据《辽史》之《营卫志》《兵卫志》《地理志》等材料,最早对辽代人口进行了较细致的研究,认为辽代总户数为76万,按每户5口计算,则辽代总人口约为380万^{[6]52-58}。

(2)1957年发表的袁震《宋代户口》一文以《辽史·地理志》为基础,统计出辽代户数为57.3万,如果分别以每户4口、5口计算,则辽代人口在230万~290万^[7]。此文研究主题是宋代户口,只是以辽代户口作为参照,对于辽代人口的估计严重偏低,且并未经过细致论证,故引起多位学者的明确反对^{[8][9]71}。

(3)1988年出版的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一书第五章“宋辽金元时期”依据辽代的户数、丁数进行推算,认为辽代鼎盛时期的州县人口约85.55万户,加上宫卫户10.6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辽代共有530万人,并将此数据确定为1114年金攻辽之前的情况。此书关于辽代人口的论述虽只有4页篇幅,但难能可贵的是首次运用了数学方法对辽代人口进行计算,并采用对数曲线方程把辽代各时期的人口都推算了出来;如第一个数据是959年,人口为321万;这之后人口持续增长,1004年为346万,1114年到达峰值530万^[10]。

(4)1991年出版的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一书第七章“宋辽金时期”对辽代人口进行了简单估算,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载各府、州、军户数合计为57.6万,其余无户口的则取《金史·地理

志》所载户数45万的一半,另有宫卫骑军户14万,则辽代共有94.12万户,以每户5口计算,共计470万人^[11]。

(5)1991年发表的王育民《辽朝人口考》一文也结合《辽史·地理志》与《金史·地理志》所载户口进行研究,认为辽代总户数估计不会少于150万,以每户平均6口计算,总人口共计900万左右^{[9]59-74}。

(6)1997年发表的孟古托力《辽朝人口蠡测》一文将辽金战争前夕即辽代人口发展最高峰的天庆四年(1114)作为蠡测人口的标准时间,在对契丹、汉人、女真等各族人口计算的基础上,按每户5人计,估算出1114年辽代人口总数约为840万^[12]。

(7)1999年出版的袁祖亮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一书第四章“辽宋金时期边疆地区的民族人口”以《辽史》三志为基础,估算辽代强盛时约有130万户,每家出兵丁2人,则每户平均有6人以上,据此辽代约有780万人^[13]。

(8)2000年出版的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一书认为,辽代实行全民兵役制,军丁数即等于丁数,故作者通过研究军丁数推测辽代鼎盛时期有140万户,平均每户6.5人,总人口为900万^[14]。

(9)2000年出版的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一书主要根据《辽史》各志对人丁数的记载去推算辽代各道的人口,并认为辽代每4人出1丁,推测每户为8口,从而计算出上京道、东京道、中京道、南京道、西京道的人口分别为280万、230万、150万、220万、170万,则辽代人口至少可达1050万^{[3]460}。

(10)2006年出版的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一书认为辽代户口分为五京州县户口、斡鲁朵(宫卫)户口、头下军州及寺院中的“二税户”、部族户口、属国户口,其中可考者为五京州县户口、斡鲁朵户口、契丹部族户口三部分,分别为99.93万户、20.4万户、16.8万户,以每户5口计,则分别为499.67万口、102万口、84万口,合计为137.13万户、685.67万口^{[15]75}。

(11)2007年通过答辩的王孝俊博士论文《辽代

人口研究》结合石刻资料与文献资料推测辽代家庭人口规模为8口,并通过细致考证得出结论:五京州县户数为87万、宫卫户数为20.5万、部族户数为20万,辽代总的户数为1276161户,以每户8口计,这三种人口合计为1020.9万,加上僧尼人口36万,则辽代末期的人口达到了10569288人,如加上著帐、奴隶、属国人口等,当不下1300万人^{[4]60-94 [5]80-125}。

(12)2009年发表的武玉环《辽代人口考述》一文主要依据两种方法考证辽代人口:一是利用《辽史·地理志》中对各道人户的记载,从而统计出辽代的总户数为96万左右;二是依据《辽史·兵卫志》所载每户所出丁数,统计出辽代各府州县的总户数为97万。这两种方法考订出的辽代户数很接近,再依据辽代碑刻墓志统计出当时每户平均为7口,加上不入籍的80万人口,则辽代鼎盛时期总人数为750万^[16]。

(13)2014年发表的杨军《辽代人口总量考》一文认为辽代人口可分为五个部分:诸斡鲁朵人口、诸部族人口、五京州县人口、属国属部人口以及僧尼、流民等不入籍人口,总户数约为166.2万,如按每户7口或8口计,总人口分别约为1243.4万、1409.6万,即使按传统的每户5口计,也达911万^[17]。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见,凡是对辽代人口进行细致测算的学者,大多是把五京州县、诸斡鲁朵、诸部族这三部分人口相加从而得出辽代的总人口,这是因为这几部分人口都在辽代户籍内且有史可依能够考订出来,其结论相对坚实。其中又以王孝俊的考证最为细致、可信——即辽代可考的总户数约为127.6万,这是笔者展开下一步研究的基础。

二、辽代汉人比例辨

辽代民族构成复杂,契丹人作为统治阶级是主体民族,汉人作为人口最多的民族也可以说是主体民族。目前已有多位学者对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进行过推测,虽然对于汉人是辽代人口第一大民族并无异议,但关于汉人人口具体占辽代总人口的多少比例,学界又存在分歧,分别为四成、

五六成与六七成不等。现按研究结论从小到大的顺序述论如下。

(一)关于孟古托力《辽朝人口蠡测》一文的相关结论

孟古托力《辽朝人口蠡测》^[12]一文选定天庆四年(1114)作为人口测算的标准时间,这一年辽代人口总数约为840万,其中契丹人约30万户150万人,汉人约330万人,分别占辽代人口总数的18%、39%。孟文认为辽代的汉人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南京道、西京道和东北地区,其中南京道和西京道基本都是汉人,东北地区的汉人则是辽代陆续从中原掠夺或中原主动来投安置到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者,此论如今已成为学界共识。一般学者都是以《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为基础来推断辽代人口,孟文则另辟蹊径,但其标准又并不统一。

先看南京道人口。《辽史·地理志》载南京道有21.9万户,但孟文认为这并非其选用的标准时间——1114年的户数,所以弃而不用,而是围绕《契丹国志·四京本末》所载“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18]241}这条史料做文章,认为应理解为燕京所辖各州县为30万户,再加上不隶属于燕京的平州所辖的3万户,则1114年南京道有33万户,每户按5人计,人口总计165万。

再看西京道人口。西京道共有45个州军县,《辽史·地理志》注明户口数字的仅31个,合计16.22万户,“剩下14个州军县未标明户口,而且难以考索”。孟文明确指出16.22万户这个数字并非同一时间数字的总和,言外之意此数字并非其选用的标准时间1114年的,但仍认为“这个数字作为参考还有一定的价值”,随后便下结论云:“天庆四年(1114),西京道总有18万户,约90万人。”然而此18万户的数据从何得出,文中并无说明。

最后看东北地区汉人。孟文依然反对利用《辽史·地理志》所载“残缺不全的数字”,与计算南京道人口一样,又根据《契丹国志》一条史料进行推论。由于现《契丹国志》点校本相关内容跟孟文所引有差异,故引孟文原文如下:“《穆宗纪》载,应历二年

(952)十月,“辽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后周与辽的边界塞障)者四十万口……中国民(中原人)被掠得归者什五六。”孟文据此认为,此“四十万口”占被掠人口的“什五六”应是事实,那么北上的汉人总有七八十万(其中包括主动北上投靠者),这其中足有60万住在东北地区,到1114年“总能发展到75万人”。

孟文的结论是:辽代1114年的汉人人口,应是当时南京、西京两道汉人人口与东北地区汉人人口之和,即165万+90万+75万=330万。

孟文独具一格的学术创新精神值得尊重,但放弃《辽史》中最基本的人口数据不用,却凭借内容错讹甚多、被学界批为“伪书”的《契丹国志》所载数字来做推论,难免令人生疑(《契丹国志》作为除《辽史》外研究辽代历史最系统、最具参考价值的文献,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但此书的缺陷我们也务必正视。刘浦江曾对《契丹国志》的来历进行了详细考辨,认为此书当为元朝书贾所作,主要取资于宋代文献,并托名南宋叶隆礼;且把该书的主要纰漏归纳为五种:篡改史料、误解原文、节录失误、机械抄书、缺乏常识,尽管“无意贬抑《契丹国志》一书的史料价值”^[19]。其观点基本已成为学界共识)。其结论成立的前提是《契丹国志》“三十万”“四十万”之数据务必可靠。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

关于前一条数据,点校本《契丹国志·四京本末》“南京条”校勘记云:“此节全本许亢宗《行程录》”^{[18]245},指明了其史料来源。许亢宗《行程录》即《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对照二者文本,《契丹国志》此段确实基本照抄前者,只是个别文字有所改易^[20],但《契丹国志》所载“燕京析津府,户口三十万”,却是前者所没有的,不知所据为何,也无法判断其准确性,且孤证不立。故仅凭此“户口三十万”的记载推断南京道的人口,似乎有欠稳妥。

关于后一条数据,点校本《契丹国志·穆宗纪》原文是:“辽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者数十万口……中国民被掠得归者什五六”,而文后校勘记

云:“流民入塞者数十万口,‘数’原作‘四’,据《通鉴》卷291改。”^{[18]63}可见《契丹国志》此条史料抄录自《资治通鉴》卷291,但却径改“数十万”为“四十万”,不知所据为何,故点校者据《资治通鉴》改回。故孟文采用并不可靠的“四十万口”这一数据来推论辽代东北地区汉人数量,结论恐难成立。

综上,孟古托力《辽朝人口蠡测》一文关于辽代汉人为330万口的结论值得商榷。

(二)关于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一书的相关结论

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一书认为,辽代总人口1050万中,汉人约为570万。其思路是先算出人口总数,然后再分别估算出契丹人为230万、渤海人为50万、女真人为100万及其他少数民族共计100万,再用总人口数1050万减去以上已估算部分,余下的即为汉人,约570万^{[3]454-465},则汉人人口占辽代人口总数的54.3%。这种思路在方法上无可挑剔,只要契丹人、渤海人等相关数据没有问题,结论就可以成立。但问题是,上述数据可靠吗?

该书对契丹人数量的推算最为细致,其方法是根据兵丁来推算民户。该书作者认为辽代的兵丁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御帐亲军(30万)、宫卫(16万)、其他(4.52万),总计50.52万,按“平均每户2丁,户均人8口”计,相应民户大约有202万人,再加上隶属于部族的大首领军(10.8万)、著帐户及不见于记载的契丹人户,辽代契丹人共有230万^{[3]456-468}。

初看结论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上该书所运用的御帐亲军和大首领军的相关数字是错误的。据邓广铭考证:《辽史·兵卫志》“御帐亲军”与“大首领军”两条记载均抄自《契丹国志》,间接来源则是宋初大臣宋琪的奏章《平燕蓟十策》,乃元人修《辽史》时在宋琪《平燕蓟十策》基础上所误增;而且御帐亲军的数目前后不同,在辽太宗时最多只有3万,《辽史·兵卫志》所载30万之数是不对的^[21]。因此,该书作者根据“平均每户2丁,户均人8口”的原则,推算出30万御帐亲军有相应民户15万户、120万人的结论是不对的,至少扩大了10倍。

又据邓广铭考证,辽代所谓部族兵,是指役属于契丹诸部以外如奚、靺鞨、女真、党项、沙陀者^[21],而不是该书作者所说的出自契丹五十四部族中的契丹人。所以,10.8万大首领军算成契丹人也是有问题的。

该书关于契丹人数量的推论虽然不够严谨,但毕竟是有数据可依的,而关于女真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数字则纯靠推测,并无任何资料支撑。因此,该书用计算出的辽代总人口数减掉其他民族人口数所求得的汉人人口数自然难以令人信服。

(三) 其他两种相关结论

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一书认为,在辽代380万的总人口中,契丹人为75万,汉人最低也有240万^{[6]58},则汉人人口占辽代总人口的63.2%。但此数据的得出只是该书作者的一种“合理推测”,并无具体论证支撑,数据从何而来也没有说明。

1996年出版的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一书附录“赤峰地区辽代人口”中指出,辽代境内共有20多个民族,其中契丹人与奚人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2%~15%,汉人占65%~70%,其余民族则渤海人最多,高丽人次之^[22]。但此书只有结论,并无具体论证过程,数据依何而得也未可知。

总之,笔者所见成果中对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给出明确数据的有以上四种,结论分别是39%、54.3%、63.2%、65%~70%。而这些数据的得出或缺乏具体考证,或所依据的材料不可靠,所以此问题尚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辽代汉人数量及比例考

辽代户口类型可分为五种:五京州县户口、斡鲁朵户口、部族户口、头下军州及寺院中的“二税户”、属国户口,但国家可以实际控制的是前四种户口^{[15]67-74},户数可考的则是前三种,总数约127.6万户^{[5]122}。辽代的汉人则主要分为两部分:五京州县民户、诸斡鲁朵的“蕃汉转户”。其中蕃汉转户即诸斡鲁朵提辖司所管之民户,应是契丹人以外,分布于

各京的以汉人为主包括其他民族的一种民户^[23]。蕃汉转户的户数,《辽史·营卫志》明确记载为“十二万三千”^{[24]410},但实际应为12.4万。既以汉人为主,姑且以2/3计,则为8.26万户。下一步则来计算五京州县的汉人民户。

《辽史·地理志》对辽代州县人口的记录是以五京道为基本单位的,且详略不一:南京道全部州军县都有户数记载,西京道记载相对较详,上京道、东京道缺漏较多,中京道缺漏最多,只有1县的户数记载。南京道、西京道是汉人的传统居住区,其人口基本都可以算作汉人,学界对其户口数量的计算近些年已趋向一致。如武玉环计算分别为27万户、18.6万户^{[16]220,223},张国庆为24.7万户、20.7万户^{[15]75},王孝俊为24.7万户、20.9万户^{[5]96,99},两道总户数则分别为45.6万户、45.4万户、45.6万户,非常接近。姑取其平均值45.5万户,视为燕云地区汉人的数量。

燕云地区是汉人的传统聚居区,而辽建国前后,从中原主动进入辽境的汉人以及通过战争俘掠的汉人,多被辽代统治者安置在契丹腹地潢河、土河流域,即上京道东南部、中京道东北部及东京道西南部。为便于说明问题,笔者据《辽史·地理志》制作了“辽代上京、东京、中京道汉人户数表”(见下页)。由于这三道,尤其是中京道的户数《辽史·地理志》缺漏严重,故需要按照一定的方法推算其相应户数,其推算标准有如下三点。

第一,《辽史·地理志》无户数记载的州县,其户数按王孝俊“临近区域参照法”进行推算,而上京道、东京道、中京道的平均户数分别是2136户、838户、3568户[王孝俊解释说:“所谓临近区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辽分五京道,每个京道的人文、地理环境应该都是相对一致的(我这里用相对一词,因上京道南北差别其实是非常大的),至少对其他京道来说是这样,各个州之间就是相邻的区域;同样,对每个州内部的环境来说,各个县又是相邻的区域。这样,每个道的户口平均数、每个州的户口平均数就成为推算缺载户数州、县的两组参考数据”]^{[5]81,112}。这是在

直接数据缺乏时相对最科学的一种估算法,其数据也应最接近史实。

第二,《辽史·地理志》记载的多民族杂居州县,若系两种民族杂居者(如上京道长泰县),或蕃、汉共同守陵者(如庆州),则取户数的一半为汉人;若系三种民族杂居者,则取1/3为汉人,并都在表中数字后加“?”以示区别。

第三,《辽史·地理志》只记载某州县有汉人,但无户数或户数记载模糊的,尽量以保守数字估算,并也在数字后加“?”以示区别(具体分析详后)。

由表中所列州县的汉人分布情况,可估算上京、

东京、中京三道汉人的户数如下。

第一,上京道地区,共有18个州县记载有汉人,并基本都有户数,无户数的一般是汉人与其他民族杂居,则可按一定标准推算出来。只有怀州的汉人户数不好计算,史载太宗“掠燕、蓟所俘亦置此”,但又只明确记载怀州下辖扶余、显理两县的户数分别为1500、1000^{[24]501-502},且均是渤海人,故保守估算怀州汉人的户数为200户。如此上京道地区汉人总计2.22万户。

第二,东京道地区,共有18个府州县记载有汉人,但只有龙州明确记载为1000户,其余都无户口记

辽代上京、东京、中京道汉人户数表			
道	府州县(治所今地)	汉人来源情况	户数
上京道	上京临潢府		
	临潢县(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波罗城)	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建。户三千五百	3500
	长泰县(波罗城南四十里)	汉民与渤海民杂居。户四千	2000
	定霸县(波罗城西)	汉民与渤海民杂居。户二千	1000
	潞县(波罗城东)	本幽州潞县民,天赞元年破蓟州掠潞县民,与渤海人杂处。户三千	1500
	怀州(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岗岗庙古城)	先迁渤海民,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	200?
	庆州(内蒙古巴林左旗西北查干木伦河西岸白塔子)	有永庆陵,置蕃、汉守陵户三千	1500
	泰州兴国县(内蒙古扎赉特旗宝力根花苏木青山屯城址)	本山前之民,因罪配隶至此。户七百	700
	长春州长春县(吉林前郭尔罗斯县西北他虎城)	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两千	2000
	乌州爱民县(吉林双辽市西)	拨刺王从军南征,俘汉民置此。户一千	1000
	仪坤州广义县(内蒙古翁牛特旗西)	应天皇后以四征所俘居之,因建州县。户二千五百	500
	龙化州龙化县(内蒙古奈曼旗西北)	太祖南掠燕、蓟,所俘建城置,东伐女真,迁数百户。户一千	500
	壕州(辽宁彰武县东南)	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居此。户六千	6000
	原州(辽宁康平县西北)	国舅金德俘掠汉民建城。户五百	500
	福州(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东)	国舅萧宁南征俘掠汉民居此。户三百	300
	顺州(辽宁阜新市东十家子车站附近)	横帐南王府俘掠燕、蓟、顺州之民,建城居之。户一千	1000
	镇、维、防州(镇、维两州在蒙古布尔根省,防州在蒙古土拉河中游西岸塔勒-乌兰·巴勒嘎斯古城址)	以渤海、女真、汉人配流之家七百余户分居三州	233?



续表

道	府州县(治所今地)	汉人来源情况	户数
东京道	东京辽阳府(辽宁辽阳市)	神册四年,以渤海、汉户建东平郡;天显三年,迁渤海人居之,升为南京;会同元年,升为辽阳府,改为东京	200?
	宣州(朝鲜平安北道义州城)	开泰三年徙汉户置,隶保州	919
	来远城(辽宁丹东市九连城东鸭绿江中黔定岛上)	统和中,伐高丽,以燕军骁猛,置两指挥,建城防守	838
	宗州(今地无考,或在鸭绿江流域一带)	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	838
	海北州(辽宁义县南开州屯)	世宗以所俘汉户置	838
	贵德州(辽宁抚顺市城北高尔山前)	太宗时察割以所俘汉民置	838
	沈州		
	乐郊县(辽宁沈阳市老城区)	太祖俘蓟州三河县民,建三河县,后改名	838
	灵源县(今地无考,当在辽宁沈阳市境)	太祖俘蓟州吏民,建渔阳县,后更名	838
	广州(辽宁沈阳市西南大高华堡)	太祖以渤海人建铁利州,圣宗时废,开泰七年以汉户置	838
	祺州(辽宁康平县东南小塔子村)	太祖以檀州俘户建,后更名	838
	庆云县(同上)	太祖俘密云县民建,后更名	
	遂州(辽宁昌图县境)	采访使耶律颇德以部下汉民置	838
	双州(辽宁沈阳市北石佛寺村古城)	洹里僧王南征,以所俘镇、定两州之民置	838
东京道	咸州(辽宁开原市北老城鎮)	招平、营等州客户数百,建城居之	838
	信州(吉林公主岭市境)	开泰初以所俘汉民实之	838
	龙州(吉林农安县)	圣宗开泰九年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	1000
	顺化城(辽宁大连市普兰店区附近)	圣宗开泰三年以汉户置	838
	衍州(辽宁辽阳市西南太子河左岸唐马寨古城)	以汉户置	838
	连州(今地无考,当在辽宁境内)	以汉户置	838
中京道	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县西老哈河北岸大明城)	统和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户	200?
	大定县(同上)	以诸国俘户居之	200?
	富庶县(辽宁建平县东公营子古城)	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3568
	劝农县(内蒙古宁城县西南二台子村)	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3568
	文定县(辽宁建平县西北)	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3568
	升平县(今地无考,当在内蒙古宁城县境)	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3568
	金源县(辽宁朝阳县西北喀喇沁)	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3568
	惠州(辽宁建平县建平镇北)	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创城居之	400?
	武安州(内蒙古敖汉旗东白塔子村)	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建城而迁之,复以辽西户益之	1784
	榆州(辽宁凌源市西北)	太宗南征,横帐解里以所俘镇州民置州	3568
	泽州(河北平泉市西南察罕城)	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	3568
	北安州(河北承德市西南滦河镇喀喇河屯旧址)	圣宗以汉户置州	3568
	潭州龙山县(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西南喀喇城)	开泰二年以习家寨置	3568

续表

道	府州县(治所今地)	汉人来源情况	户数
中京道	兴中府(辽宁朝阳市)	太祖平奚及俘燕民,于此建城	200?
	兴中县(同上)	太祖掠汉民居此,建霸城县。重熙中置府,更名	3568
	营丘县(今地无考,当在辽宁朝阳市附近)	析霸城置	3568
	黔州(辽宁北票市东南)	太祖平渤海,以俘户居之。后析宜、霸二州汉户	1784
	宜州(辽宁义县东北)	益之	
	弘政县(同上)	兴宗以定州俘户置	3568
	锦州(辽宁锦州市)	世宗以定州俘户置	
	岩州(辽宁兴城市东南菊花岛上)	太祖以汉俘建州	3568
	建州(辽宁朝阳市西南)	太祖平渤海,迁汉户杂居	1784
		故石晋太后诣世宗,求于汉城侧耕垦自贍,许	500?

按:表中资料来源于《辽史·地理志》,“治所今地”则依据张修桂、赖青寿^[25]与余蔚^[26]的研究成果

载。无户口记载的府州县里,东京辽阳府的情况跟怀州类似,仍保守估计为 200 户。除了辽阳府,其他州县都可以采用“临近区域参照法”推算户口。其中宣州隶属于保州,故取保州地区平均户数 919 户,其他州县则都是取东京道平均户数 838 户。如此东京道地区汉人总计 14689 户。

第三,中京道地区,共有 21 个府州县记载有汉人,但均无户数记载。按“临近区域参照法”推算出的中京道平均户数 3568 户估算,则中京道汉人户数总数为 53286 户。可见中京道地区是除燕、云以外汉人第三大聚居区。中京道有些州县的情况还需要说明如下。

大定府、兴中府,按辽阳府例,仍保守估计各为 200 户。大定府大定县,史载“以诸国俘户居之”,亦以 200 户估之。中京大定府辖下的富庶、劝农、文定、升平、金源 5 县,均是“开泰二年析京民置”,此“京民”,即中京之民。而《辽史》卷 39《地理志三》载:“(统和)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府曰大定。”^[24]可见中京民户以汉户为主,则从中京析出的此 5 县民户,也应以汉人为主。故每县均取采用“临近区域参照法”推算的中京道平均户数 3568 户。惠州,史载“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创城居之”。“数百户”,按汉语表述习惯,估为 400 户应不为多。建州,《辽史·地理志》载:“故石晋太后诣世宗,求于汉城侧耕垦自贍。许于建州南四十里给地五十顷,营

构房室,创立宗庙。”^{[24]553} 后晋出帝石重贵与后晋太后一行辗转几地最终在建州居住下来,其随行应包括一些汉人,而此则史料也明确记载建州有“汉城”,故建州估为 500 户应不为多。

综上,将上京道 2.22 万户、东京道 14689 户、中京道 53286 户汉人与燕云地区 45.5 万户汉人相加,则辽代五京州县汉人总户数约为 54.52 万(辽代有“一户两丁”之通例,此“丁”即“兵丁”^[27],故也可通过五京兵丁数来大致推知汉人户数。《辽史》卷 36《兵卫志下》载:“辽建五京:临潢,契丹故壤;辽阳,汉之辽东,为渤海故国;中京,汉辽西地,自唐以来契丹有之。三京丁籍可记者二十二万六千一百,蕃汉转户为多。析津、大同,故汉地,籍丁八十万六千七百。”^{[24]473} 根据“一户两丁”之通例,则南京、西京两道至少有 40.3 万户,且几乎全是汉人;上京、东京、中京三道共有丁 22.61 万,“蕃汉转户为多”,可计蕃汉转户为 11.3 万户,按汉人占 2/3 的比例,则为 7.53 万户。这样五京道共有汉人 47.83 万户,可资参考)。再加上诸斡鲁朵“蕃汉转户”中的汉人 8.26 万户,则辽代汉人总户数约为 62.78 万。而辽代可考的总人口有 127.6 万户^{[5]122},则汉人人口在辽代总人口中的比例为 49.2%,既非孟古托力推论的 39% 那么低,也非项春松所云 70% 那么高。

辽代有 62.78 万户汉人,这个数据是依托《辽史·地理志》记载所得出的,且当是天祚帝天庆三年的数

据《辽史·地理志》中的户数记录均没有明确系年,韩光辉经考证认为《辽史·地理志》所载户数就是天庆三年“籍诸道户”的统计数^[28],张国庆、王孝俊均认可此观点)。不过真实数据应大于此数据,因为一些《辽史·地理志》未载有汉人居住的州县从近年公布的墓志可知实际是有汉人居住的(如《张雄墓志》载:“公姓张氏,讳雄,其先川州宜民县中台里人”^[29],可见中京道川州宜民县也有汉人),再加上不入籍的僧尼、隐户等,汉人数量占辽代总人口的五成以上应该是成立的。而辽代平均家庭人口数在8人以上^{[5]85-90},如按8人计,则汉人人口为502.2万。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502.2万是辽末的汉人数量,是汉人经历百余年甚至二百年自然增长所达到的人口最高峰,但从辽初到辽末,各民族人口均会经历自然增长,故汉人人口占辽代总人口五成以上的比例应大致稳定,且此比例也应比太宗并入燕云时期低,毕竟从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签订后,原则上辽不能再从中原地区获得人口,汉人“机械增长”的部分就没有了。

汉人作为辽代人口第一大民族,其人数占据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契丹、奚、渤海、女真等其他民族则共同构成辽代另一半人口,如何统治数量如此庞大的汉人,是契丹统治者面临的难题。不过,千年后的我们可以“盖棺定论”地评述说,契丹统治者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其“因俗而治”政策卓有成效且富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刘浦江:《试论辽朝的民族政策》,氏著:《辽金史论》,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 [2]谭其骧:《辽代“东蒙”、“南满”境内之民族杂处——满蒙民族史之一页》,氏著:《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257页。
- [3]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4]王孝俊:《辽代人口研究》,郑州: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 [5]王孝俊:《中国人口通史》(8辽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6]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纽

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9年版。

- [7]袁震:《宋代户口》,《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
- [8]费国庆:《关于〈宋代户口〉一文辽代部分的意见》,《历史研究》1958年第8期,第46-50页。
- [9]王育民:《辽朝人口考》,《辽金史论集》(第5辑),北京:天津出版社1991年版。
- [10]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255、276-277页。
- [11]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 [12]孟古托力(孟广耀):《辽朝人口蠡测》,《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5期。
- [13]袁祖亮主编:《中国古代边疆民族人口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252页。
- [14]吴松弟:《中国人口史》(第3卷辽宋金元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7页。
- [15]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 [16]武玉环:《辽代人口考述》,《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6期。
- [17]杨军:《辽代人口总量考》,《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 [18]叶隆礼:《契丹国志》,贾敬颜、林荣贵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
- [19]刘浦江:《关于〈契丹国志〉的若干问题》,《史学史研究》1992年第2期。
- [20]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1-212页。
- [21]邝广铭(邓广铭):《辽史兵卫志“御帐亲军”“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溯源辨误》,《北京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
- [22]项春松:《辽代历史与考古》,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9页。
- [23]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61-62页。
- [24]《辽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
- [25]张修桂、赖青寿编著:《〈辽史·地理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26]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 [27]张晨光:《吴松弟〈辽代人口新考〉驳议——兼谈辽代的“丁”》,《史学集刊》2022年第6期,第119-125页。
- [28]韩光辉:《论〈辽史〉户、丁系年问题》,《北方文物》1999年第1期。
- [29]都惜青:《金代〈张雄墓志〉考释》,《东北史地》2014年第2期,第34页。